



在气候问题上， 这是我们最后也是最好的机会

在格拉斯哥举行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
可能引领我们进入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新时代

阿马尔·巴塔查里亚和尼古拉斯·斯特恩

新冠疫情表明，人类的生存环境是脆弱且危险的。然而，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其损害可能比新冠疫情的影响更大、更持久。我们现在做出何种决定，对塑造人类和地球的未来至关重要。我们绝不能回到过去那种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的常态；当务之急是通过可持续、包容且有韧性的增长，来重建更好的家园。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在其 2018 年发布的特别报告《全球变暖 1.5°C》中强调了全球升温超过 1.5°C 的严重风险, 其指出气候变化的影响已经很明显, 而阻止气变已经迫在眉睫。有预测显示, 更快、更严重的气候变化将对自然环境和人们的安全与生活生计造成更大的伤害。例如, 如果升温幅度若从 1.5°C 增加至 2°C, 全球珊瑚礁的死亡比例将从 70% 至 90% 上升至 100%, 每五年至少遭受一次极端高温的人口数量也将从 14% 上升至 37%。如果升温幅度超过 2°C, 全球出现更大、更不可逆环境变化的风险将大大增加。IPCC 的 2021 年报告指出气候变化正急剧加速, 将全球升温幅度从 2°C 降到 1.5°C 的窗口期已大大收窄, 到 2050 年实现净零排放已刻不容缓。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 气候变化的风险和经济损失是被低估了。如果不加以控制, 气候变化可能会使数亿人流离失所, 这些人中大部分生活在发展中国家, 这将增加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同样, 碳密集型经济体所依赖的一些行业, 在未来可能会被淘汰, 以减少污染和避免灾难性气候变化。一旦这些行业的工人下岗并失去收入, 其中的许多将陷入贫困。去碳化耽搁的时间越长, 未来的冲击就会带来更多的混乱。

随着科技的进步, 可再生能源的成本正在下降, 这也使得可再生能源对化石燃料的竞争在增强。此外,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去碳化并不影响增长、发展以及就业, 而是开辟了一条道路, 通过它可实现更具包容性、更有韧性和更可持续的增长; 事实上, 它可以“开启二十一世纪包容性增长的新篇章”。

投资和创新

增加对可持续基础设施的支出具有强大的乘数效应。在短期内, 它可以通过创造就业和投资机会, 帮助世界经济从新冠疫情的影响中恢复过来。从中期来看, 它可以刺激创新, 创造新的增长点, 减少贫困和不平等, 同时提供更清洁的空气和水。

从长远来看, 稳定气候变化是通往可生存的未来的唯一途径。

为了实现去碳化, 政府必须与利益相关者合作, 鼓励清洁的能源和运输系统、智能化的开发、可持续的土地使用、明智的水资源管理和循环工业经济。同时, 需要进行重大投资以取代老化和污染严重的基础设施, 解决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和结构性变化, 并保护和修复自然资源。在为七国集团 (G7) 准备的一份报告中, 我们断言到, 在这个十年及以后, 世界各国必须将每年在可持续基础设施的投资增加到占新冠疫情前国内生产总值的 2%。

其中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除中国外) 需要更大力度来推动可持续基础设施的建设, 因为最近它们的投资急剧下降, 它们也需获得资金, 以支持其经济增长、发展目标和结构性改革 (包括快速的城市化)。未来 20 年将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转型的关键时期, 这要求对各类资本——包括实体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加大投资。

无论在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 投资

第 26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26) 的目标

近三十年来, 联合国一直在召集地球上几乎所有国家参加全球气候峰会。在今年英国担任主席国期间, 全球气候峰会将在格拉斯哥举行。由于受新冠疫情的影响, 第 26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26) 推迟了一年, 届时, 世界各国领导人、科学家、企业、公共和私人领域的金融界人士、气候活动家、记者和其他观察员将聚集一堂。

以下内容是格拉斯哥会议的关键目标:

- 广泛的净零目标和可靠的融资方案。
- 加快向零碳电力和零碳交通转型的集体承诺和路线图, 以及在碳定价、部门政策、淘汰煤炭和支持创新方面采取雄心勃勃的行动。
- 支持适应气变和气候韧性, 特别是在贫穷和脆弱的国家, 支持保护和重建自然资本。
- 调动私营企业和资金以支持这些目标, 并将资金输送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可靠的碳价格将发出一个关键信号，将投资和创新直接转向清洁技术并鼓励提高能源效率。

都可通过低碳、零碳等解决方案，为其向净零排放加速转型提供巨大的潜能——这包括从可持续航空燃料到电动汽车在内的一系列途径。2020年的“巴黎效应”报告发现，到2030年，低碳解决方案可能在排放量占比70%的行业中具有竞争力，而现在这个比例只有25%，5年前更是没有。

更有力的政府支持和更紧密的国际合作可以帮助包括发展中经济体在内的所有国家加快创新步伐，进一步降低成本，并确保低碳技术得到广泛使用。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现在就需要更多的投资和财政刺激，以应对新冠疫情的影响，同时在中期负责任地管理债务和赤字。财政政策可从收支两端来促进向低碳、包容性增长转型，这包括通过编制绿色预算予以实现。

加速变革的政策

政策制定者必须设定预期，并就如何实现净零排放目标提供明确的方向。为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越来越多来自学术界、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声音都呼吁取消化石燃料补贴并实施碳定价。可信的碳定价将发出一个关键信号，引导投资和创新转向清洁技术，并鼓励提高能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说，“没有碳定价我们根本无法实现《巴黎气候协定》的目标”，且为实现有效的碳定价，“其定价信号需要以可预见的方式得到加强。到2030年，每吨二氧化碳的全球平均价格需达到75美元，远远高于现在的每吨3美元”。

考虑到严重的市场失灵、其他强有力政策工具的可用性以及政治经济上的障碍等因素，除了碳定价，向气候适应性增长的转型将需要许多相互支持的不同政策。正如最近一份文件中所概述的，政府和私营部门必须

- 通过制定具体部门的政策——监管法规、能效标准、收费返还政策——以加强碳定价，并逐步淘汰煤炭。

- 促进对可持续和有韧性基础设施的公共投

资，包括自然的解决方案（修复退化土地、保护现有生态系统），同时减轻对贫困人群的影响。

- 通过政策措施促进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例如，为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制定法规、改革农业和水的补贴，以及鼓励循环经济，使经济增长与物质资源的使用脱钩。

- 部署产业政策和其他政策，鼓励气候友好型创新，包括在数字化、新材料、生命科学和生产过程中的创新，重点关注各领域的政策协调以及长期政策和政策规划上。

- 提供信息并促进公众对社会规范和行为的讨论，以减少消费及商业活动的能源需求和碳密集程度；教育公众了解气候变化的风险，了解应对自然灾害的早期预警系统和疏散计划。

- 使金融与气候目标相一致——管理气候变化带来的金融稳定风险；使社会和私人回报与绿色投资相一致；调动投资资源，包括大力推动国际气候融资；使货币和监管政策与净零排放目标相一致。

- 开发保险工具和社保体系，减轻气候冲击的直接影响。

- 通过投资，以及受低碳经济转型影响的工人、企业和地区给予支持，来促进公平转型——快速的变化将使生产和消费出现紊乱。

- 将可持续发展纳入公共财政管理和公司治理中；在决定政策优先事项、衡量民生福祉和考虑可持续性时，使用更好的模型且不只是考量国内生产总值这一指标。

通过在气候变化方面采取共同行动，各国将从更强劲的需求扩张和投资复苏、规模经济以及新技术带来的低成本中受益。考虑到新冠疫情后高企的失业率、全球对疫苗的需要以及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环境恶化等日益严重的威胁，合作和创新的回报在目前看是非常可观的。如果对上述挑战应对不当，就会威胁到人类健康、经济繁荣和地球的未来。

调动气候资金

要在全球气候行动方面取得进展，就需要与之相应的雄心来推动气候融资。虽然拥有大量的长期储蓄，世界各地的利率也非常低，但许多新兴市场和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发现难以获得足够的长期融资，且资金成本是可持续投资的主要障碍。

发达经济体承诺在 2020 年前提供 1000 亿美元的气候融资，这不只是具有象征意义，更是气候行动的基础。1000 亿美元承诺的兑现进程，对于即将召开的会议的成功以及发展中世界的气候行动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富裕国家需要在七国集团峰会承诺的基础上再接再厉，在 2021 年至 2022 年增加气候资金，并在 2025 年前将其翻番至 600 亿美元。同时，它们亟需提高气候融资的质量，大大提高捐赠款的比重（目前其处于较低水平），尽快将用于适应气候变化的资金增加一倍，并确保将至少一半的优惠贷款用于支持适应气候变化和增强对气候变化韧性的目标上来。

由于其自身的职能、工具和财务结构等特点，多边开发银行是支持发展中经济体气候行动以及调动、利用气候资金最高效的机构。在当前的危机时刻，这些机构必须倾其所能、使用他们所有的工具，同意在 2025 年前将融资增加至 2018 年水平的 3 倍。这将需要今年加速补充国际开发协会（IDA，世界银行援助最贫穷国家的基金）的资金，更有效地利用开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加强私营部门的资金调动，加速与《巴黎气候协定》对接，并积极增加资本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恢复性和可持续性发展信托基金”，也可以帮助支持这些行动；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和贝索斯地球基金会提出的建议，也提供了利用优惠气候资金的其他方法。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倡导的一些国家平台目前尚未得到有效的应用——使用这些平台，是加强协作的另一种选择。

通过第 26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的私人融资议程，结合金融稳定理事会与气候有关的金融披露工作组、央行和监管机构绿色金融

网络、财政部长气候行动联盟、欧盟可持续金融专家组以及最近成立的二十国集团可持续金融工作组等倡议，诸多努力使金融体系与气候风险和机会相协调。

从承诺到行动

对即将于 10 月 31 日召开的格拉斯哥会议，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John Kerry）将其描述为应对气候变化威胁的“最后也是最好的机会”。在阿洛克·夏尔马（Alok Sharma）的领导下，第 26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的主席国——英国已经为格拉斯哥会议制定了优先事项：对净零排放目标的承诺。加强适应气变和气候韧性的行动，兑现 1000 亿美元的气候融资承诺，支持和转变私人融资，并在所有这些目标上加强合作。

我们已经看到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在 6 月的卡比斯湾会议上，七国集团峰会承诺到 2050 年实现净零排放，在 2010-2030 年期间将集体排放减半，在 2025 年之前增加和改善气候融资，在 2030 年之前保护至少 30% 的土地和海洋。而且，二十国集团峰会首次表明需要在碳定价方面采取行动。在私营部门层面，越来越多分属不同行业的企业已经承诺实现净零目标，主要的金融机构的投资组合已经设定了达到净零的最后期限。

未来的十年将是决定性的。在国家 and 国际层面上的作为，将决定我们在疫情后时代能否实现强劲包容的经济复苏，以及我们能否走上可持续增长的新道路。如果我们做对了，我们就能迎来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新时代，为全世界人民带来更多的机会。如果弄错了，我们不仅会失去一个发展的十年，而且地球上的人们将在未来的几十年面临巨大的危险。我们现在就需要做出选择——做出明智地选择。FD

阿马尔·巴塔查里亚（AMAR BHATTACHARYA）是布鲁金斯学会全球可持续发展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首任帕特尔（IG Patel）学术委员会主席和理事以及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的主席。